# 说 明

这是意大利在获得国家统一之后的意大利史的概述：它不像已经有过的众多编年史中的任何一部编年史，也不是以这种或那种意义讲述的带有某种倾向性的历史，而是以历史事件的客观联系，并追寻这些事件的内在根源的方式来展现它们的一种尝试。讲述的时间段为 45 年，即人们所称的“和平”的那 45 年；但是，对于不想把这些事情只归于严重冲突和明显的重大事件，甚至在战争和革命面前总是用理性和心灵来寻找其真正运动和戏剧的人而言，这些年也展现出了它们的运动和戏剧。毫无疑问，这段历史的认知，对我们意大利人来说，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但它也有着另一种更为普遍的重要性，因为它是欧洲较近历史的一部分及其反映。

我知道，我所涉及的一些东西仍缺少所希望的准备工作，但是，如果没有努力地要勾画出整体画面的这种需要，这些东西也不会产生出来。

我中止于 1915 年，意大利进入世界大战的那一年，因为世界大战之后的阶段，仍在进行，它不是历史学家的，而是政治家的事情。我从未想过把历史研究混淆于或沾染上政治论战，政治论战在做，而且也肯定应该做，但要在其他地方去做。

那不勒斯，1927 年 11 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在这个版本（第九版）中，像以前的几次再版一样，除了重新审校之外，没有其他的重大修改。这个版本已经出来约四年了，在罪恶的体制倒台之后（这种体制是意大利历史中的一段插曲），意大利现在可以在自由中呼吸了——尽管目前仍然面临很多困难和危险。在 1927 年我写作此书时，从我这方面讲，我从未失去对自由的追忆和热望，所以，对当时的很多人来说，这本书曾是亲切的，但对我而言，则一直是亲切的，我现在重读它时，仍有些激动。希望它在未来能够成为讲述我们历史的那三代人（即 45 年）的情感和思索的见证。

B. 克罗齐

1947 年 3 月

# 一

# 1870年之后的政治论战和历史现实

1871年，王国的首都定在了罗马，在意大利，人们感到，多年追求的目标，一个完整的体制已经全面建立，一个历史阶段已经结束。意大利已经获得了独立、统一和自由，在它面前，已经出现了既是公民的又是民族的、既是个人个体又是民族个体的自由行进之路，而这是与争取文明和政治自由紧密相连的，19世纪的民族的浪漫主义运动的最深层的意识。就这方面而言，至少对当时来说，是没什么可再要求的了，人们应该感到满意了。

任何历史阶段的结束都意味着某些东西的死亡，尽管这些东西曾被追求过、索要过，也内在于明晰描绘出的、被努力执行过的事业之中；但这种死亡，像任何死亡一样，也伴随着惋惜和伤感。不再有对新的、高远的理想的希望和燃烧的热情；不再有波动的、无际的、如此美好的梦想之闪烁；不再有苦痛而又甜蜜的多磨难之爱的煎熬；不再有1848年和1859年那样的希望的焦虑；不再有广泛的拼比，和为了集中于一个共同目标而对自己特殊观念的放弃，不再有共和主义者和君主制者，天主教信徒和理性主义者，高官和革命者，国王和阴谋家或默然或公开的一致，所有这些人对祖国的宗教般的虔诚不再具有主导性和权威性；不再有1860年的意大利的从此处到彼处的欢呼和被压迫者的叹气，不再有流亡者的回归和各地区人民的兄弟之情——大家都已经是

意大利人。承受过的危险、苦难、痛苦，参加过的战役，遭受过的东躲西藏、刑罚、监狱和终生监禁，已被感慨所代替。很多人都感到，他们生命中的最好部分已经过去。所有的人都说（国王在加冕演说中也同样说），新意大利的“英雄主义”阶段已经结束，我们进入了经济工作的有序阶段，“散文”已替代了诗。批驳诗（理想和斯文之风气的标志）不在于物，而在于心灵，是心灵把诗注输到它所涉及的物之中的，批驳新的散文应该是诗，是与过去不同的、但同样是美好的诗，并举尼诺·比西奥①——一位经过多次战役活下来的荷马的阿喀琉斯式的人物，却作为船主为了意大利的海上运输业而牺牲——为例，是不合适的、没有用的。嘲笑不安分者和急躁者也是不合适的、没有用的，他们指责意大利议会的辩论“空洞无物”，询问意大利是否已经建立，因为它什么也没有做，他们认为在意大利没有青春就已步入老年；他们感叹与前一阶段的目标的清晰、明确相比，现在却举棋不定，不知该做什么。对他们理性地回答说，不再需要苦难祖国的造反的、战斗的、痛苦的英雄是件幸事，议会很少干事并不是大的灾难，前一阶段的行动的直线的单纯性应导向现阶段的内在的复杂性——就像人们总要从普遍性走向特殊性一样，可能也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种自然的心灵状态，没有这种心灵状态恐怕是不自然的。但是提醒如下事情却并非多余和不合适：把在“理想实现”之后形成的那种心灵状态作为评价标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把民族复兴的意大利和其后完成统一的意大利进行公开的或含蓄的比较，并根据这些比较把我们讲述的从 1871 年到 1915 年的新阶段描述成平庸的或低等的阶段，甚至和前一阶

① 尼诺·比西奥（Nino Bixio，1821—1873年），意大利爱国者、将军，1880年被选为参议员。——译注

段相比，把它描述成沉沦的阶段，是没有根据的。

还有一种评价，它是从另一种标准出发的，甚至是从某种沉重的历史标准出发的： 1870 年以后的意大利缺少自己的纲领或者说缺少自己的使命，缺少对它的民族复兴的证实，即没有它所希望的伟大，因而它是平庸的，并非崇高的。但那种“使命”究竟是什么，却一直没有定论；有些人认为它是促进和完成解救地上所有被压迫人民的义务；认为是把世界从天主教教会的精神桎梏中解放出来，打碎它的世俗的权力，创建一个新的、人道的宗教；最后，认为是要创建“第三个罗马”而立于世界的顶峰，超过，在思想和作为的质量上超过古代的罗马和天主教的罗马。这些其实是马志尼主义、加里波第主义、焦贝尔蒂主义及民族复兴运动的余响和遗存。连 T. 蒙森①也曾激动地问 Q. 塞拉②：“ 在罗马，你们企图做什么。这让我们所有的人担忧。罗马并不是没有世界主义的意图的。”塞拉回答说，在罗马，意大利的世界主义的意图是“科学”。蒙森的这件轶事就是建立在那种虚假评价的源头之上的，这种虚假的评价可以在浪漫主义的历史编纂学中找到，它把过去的历史人为地普泛化，并赋予不同的民族以特殊的使命，不理解除了民族的尊严，一个民族是没有使命的。因此，没有必要批判和否认为意大利设计的这种或那种使命，也包括塞拉所说的和我们想不起来的其他的使命；但需要批判和否认各民族应承担的“特殊使命”的这个概念。事实上，各民族和单个的个人一样，除了普遍性的使命，即人道的和理想的生活之外，是没有其他使命的，这要根据提供给它们的物质和机遇，不

① T. 蒙森（Teodoro Mommsen，1817—1903 年），德国的意大利学家，他的巨著《罗马史》、《罗马国家法》有很高的学术成就。 ——译注

② Q. 塞拉（Q. Sella，1827—1884年），意大利政治家，曾任财政部长； 1870 年法国驻军撤离罗马，他劝国王占领该城作为王国首都。 ——译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断地把目光从地上转到天空，从天空转到地上；在不同的时代和环境中，它们进行的这种或那种行动或要完成的一种“使命”或多或少是突出的，甚至在不同的时代，一种使命是非常突出的，能压过其他的使命，但是从不可能有预先定下的、根据想象的历史规律定下来的使命。这种使命将是与众多神话一样的一种神话，它时而导向目标时而偏离目标，时而活跃时而消沉，时而带来益处时而带来损失；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提供出一种历史的标准，提供的只是否定或改变事实的一种武断的尺度，总之，它让人难以理解事实。

如果要继续排除一些虚幻的东西和不正确的反思——它们在总体上干扰了对这一历史阶段的观察，那么就要追溯其源，追溯到政府中右翼的那次倒台。被右翼人士及其同情者视为不义、不公和灾难的那次倒台，在后来的一般所接受的评价中，被认为是从未达到一定高度的意大利政治生活格调的大幅度下降。在以后的几个 10 年间，被欣赏和奉为楷模，被徒劳地希望和呼唤的右翼，并没有失去黄金时代的和议会意大利的良好开端时的面貌，但这种开端却很快和永远地结束了。 1876 年 3 月 18 日，右翼遭到打击的、似乎标志着“议会革命”的真正革命日的投票的那一天，在人们的回忆中只是不祥的一天①；而 1861 年 6 月 6 日，意大利已失去它所盼望和需要的 C. 加富尔②的天才领导；后者的逝世属于自然的残酷无情，但前者却验证了意大利人民在道义上的不太严肃。在这里，这种已经存在和又重新活跃起来的情感是不会遭受非议的，因为很少有一个民族有过一群高尚的，像意大

① 1876 年 3 月 18 日，主政的右翼在议会投票中被击败； 25 日，清一色的左翼内阁组成。——译注

② C. 加富尔（Camillo Cavour，1810—1861 年），意大利王国第一任首相，为意大利的统一作出过巨大贡献。——译注

利老的右翼那样的人来管理公共事物，由于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对道德的热爱，由于他们生活的严肃和具有的尊严，由于他们没有个人的私利，由于他们的思想和头脑的活跃，由于他们从年轻时就遵守并保持终生的宗教戒规，他们完全有权力被视为楷模，如里卡索利①、拉马尔莫拉②、兰扎③、塞拉、明盖蒂④、斯帕文塔⑤及与他们相合的少数人，还有一些精神贵族的成员、正直之人和绅士。他们的行为，他们给我们写出的字句，是道德教育和文明教育的永不枯竭的源泉，他们劝诫我们，让我们感到欣慰，有时也让我们感到脸红；因此，可以说，如果从他们手上失去了政府的短暂的权力，那他们却保有持续的内在的权力，他们每个人都足够进入民族伟人的万圣殿里。

但1876年3月18日的那场灾难，除了从政府中排挤出一些人来，难道没有排除和中断他们的政治作为，使他们的作为解体和抛弃他们的政治理念吗？事实正好相反，如果看一下事实，有的只有对那种作为的巩固，是政府中他们的对手和后继者对他们的政治理念的维持和继续。这些后继者想要一个结合于过去之躯干上的意大利，这躯干依然强壮和富有生命力，他们也是萨沃伊君主国的支持者。这些后继者，还有老的共和主义者和新近皈依的共和主义者，放弃了人民主权和制宪的老观念，宣称并表明他

① 里卡索利（B. Ricasoli，1809—1880年），意大利政治家，曾任意大利王国首相。——译注

② 拉马尔莫拉（A. Lamarmora，1804—1878年），意大利将军、政治家，曾任意大利王国首相。——译注

③ 兰扎（G. Lanza，1810—1882年），意大利政治家，1864—1865年曾任议会议长，1869年组阁。——译注

④ 明盖蒂（M. Minghetti，1818—1886年），意大利政治家，曾任意大利王国首相，他反对历届左翼政府。——译注

⑤ 斯帕文塔（S. Spaventa，1822—1893年），意大利爱国者和政治家、意大利王国参议员。——译注

们是虔诚地忠于君主国的。在他们没有掌权之前，就已经脱离了自己的过去，和“历史的左翼”相对，他们提出了没有乌托邦和革命幻想的“年轻的左翼”。他们想要国家世俗化，但是小心谨慎地、非激烈地和意大利的大多数人的天主教信仰相冲突的世俗化，所以，是遵守由法规和特殊法律保证的教会自由的世俗化。这些继任者没有触动被继任者的法律，而是小心和努力地经受了第一次教皇秘密选举的考验，这次选举进行得很安静，在并非教皇国的罗马没有引起麻烦；说到报复和战争的进行，很难说他们采用的手段比右翼需要的那些更为严重，尽管他们让反教权的表示发泄出来，但这些表示要考虑到教皇庇护九世的性格，他似乎更喜欢以破口大骂来刺激这些表示。这些继任者想强化国家的权威，不仅对抗反对党和教权派，反对他们顽固坚持的东西，而且反对残存的共和主义者的少数派，反对国际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刚刚形成的核心；这些继任者对此十分坚定，有时采用的方法甚至是严厉的、不尊重别人的，如果说，由于理论的信仰，他们采用了其他的方法，但他们的目的并没有改变，当公共舆论和他们的朋友认为他们没有取得成果时，那些同样的方法也会被放弃。这些继任者需要明智、谨慎、通过外交手段由内阁执行的对外政策，以抵制不负责任的力量之干扰，这些力量过去曾通过千人军①的功业加速了意大利的统一，现在却威胁要成立一个与国家机构平行的机构。这些继任者曾是加里波第主义者和行动党，是千人军远征的鼓吹者，但现在，在和中欧的保守列强结盟时却十分谨慎、小心。这些继任者要求意大利的国家财政法和财政“平衡”，不顾反对者抱怨政府没有能力满足统一的费用，其领袖，过去作为反对派的领袖，曾在承受过沉重税收的人民的欢呼声和

①千人军，指在意大利民族统一的运动中，加里波第指挥的志愿军。 ——译注

期待中跳了出来，现在却祝愿他的政府不要放弃一个里拉的收入，并向右翼提出过的预算平衡表示敬意，和表现出他会注意右翼经过千辛万苦才达成的这一点。这些继任者对要解决的问题十分慎重，是比德普雷蒂斯[①]——在接着的十年间执掌政府而中间很少间断那个人，还要谨慎的人，他们怎能不倾向与其多干事不如少干事呢？我们列举了掌权的左翼之作为的各个方面，发现它和右翼的行动理念没有什么不同。右翼并没有随着 1876 年 3 月的议会革命解体和被抛弃。

右翼的一些人对此是同意的，他们认为“左翼政府和右翼政府是一样的”，但又补充说政府“变坏了”。在这种“变坏了”的指控中，也确实隐藏着两派的区别，但这种区别不在于保守和进步，因为很清楚，右翼可能是比左翼更大胆的改革者，而且在实践中是较少“专制主义”的，这种专制主义是左翼从它的过去的朋友拿破仑三世那里学来的，而且还是热衷于抛出和重复一些侮辱和诽谤的专制主义；但在公共生活的不同方面，在对待进步和自由的不同方式上，简单地说，它们的区别是“自由主义”和“民主”（或者说是“激进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的区别。对右翼的那些人来说，自由和人们承认的知情权、正直和能力有关，人们能够以公共精神来选择自己的代表，这种自由还要求认识真理的勇气，理性的讨论和对其结论的接受，要求思想和行动的一致；他们蔑视蛊惑人心的政客的空谈，把这空谈视为腐败的、与个人或地区或一些群组的利益相关联的手段。由于这些原因，他们在排斥那些道德上不负责任的、相信阴谋和战争的政治人物上抱成一团，尽管在实际效果上，后者为祖国曾做出过有益

① 德普雷蒂斯（A. Depretis，1813—1887年），意大利左翼领袖，曾任多个部长职位。——译注

的服务，人也是干练和大胆的；还是由于这些原因，他们拒绝扩大选民，实际上能选举的人是有限的，但他们觉得过多，认为重要的是选民的质量；其结果是，他们的对手使他们这些和国家的“共命运者”和“专制主义者”声名狼藉；这些对手要求“保护”意大利人民的自由，并以他们所说的“民主”和“进步”的制度来对抗右翼的那个制度。一般来讲，这些对手源自不同于右翼那些人的知识分子，他们是老的“新归尔甫派”①、焦贝尔蒂②主义者、浪漫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历史主义者，还有启蒙主义者、雅各宾派和马志尼③派；他们的文化修养不足或较低；公共意识的传承也不相同，是一些习惯于阴谋和造反的人，在选择盟友时并不慎重——就连南方的改头换面的波旁派人士也对他们的新秩序不满，准备离开他们，准备不去过多地考虑答应不能履行的事情，或者说假装同意他们的要求，以拖延时间使其成为不可能，准备拒绝使其丢面子——他们的这种面子很有名（没有必要加以特殊的说明），就像他们采用的民主手段一样有名——的行动和接触。

但是，自由主义和民主或民主自由主义的关系已经不再是两种经验主义的现实的关系，而是一种理想和一种经验主义的现实的关系，规则的理念和落实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

① 新归尔甫派，归尔甫派和吉伯林派是 12—15 世纪的两个对立的政治派别。归尔甫派主张联合教皇，反对神圣罗马帝国对亚平宁半岛的侵略，亦称教皇派；吉伯林派主张依附神圣罗马帝国，亦称皇帝派。新归尔甫派指意大利民族复兴时期的“教皇派”，新吉伯林派指“王权派”。——译注

② 焦贝尔蒂（V. Gioberti，1801—1852 年），意大利政治家、天主教哲学家，在政治上，反对用暴力统一意大利，提倡君主立宪制；也曾主张创建以教皇为首的意大利联邦——译注

③ 马志尼（G. Mazzini，1805—1872 年），意大利政治思想家，争取意大利独立统一的主权、主张意大利实行共和制。——译注

理想和规则的理念之力量在于这种关系本身的存在，在于它落实理想的效果，而理想和效果并不是完全合拍的。如果民主自由主义缺乏完整的规则的理念，那它就会转化成粗野的、派别的暴政，根据那种缺乏的大小的程度，转化成或多或少的暴政，这种暴政有时会达到极限，但在通常，却保持在可容忍的范围内，让自由主义政府的理想在没有极端变形的情况下反映出来。右翼的人受教育于加富尔与之联系在一起的七月君主国的传统，似乎他们对这种规则的特点一无所知，把自由主义想象成一种经验主义的事实；在这方面，他们犯了错误。不考虑到几个世纪塑造成的、摆脱了最近战争的意大利人民的需要、热情、甚至是特殊的利益、无知和幻想是不可能的，想象和推测出不同于“国王的国家”也是不可能的；当人们清楚地知道不能依靠保守阶层，已不存在的贵族阶级和厌恶他们而他们与之战斗的神职阶层的支持时，极其蔑视妥协和搞宗派是不可能的；不利用活动能力和选举的组合技巧也是不可能的；右翼的一个人，本吉，在捍卫和赞扬自己的派别时说：“要为大事”（公众的大的利益），而不要为“小事”（个人的、群组的和地区的小的利益）欲做准备，这方面的事让对手去做吧；特别是不注意到意大利南方的状况也是不可能的，由于新的经济，新的贸易，它的情况相对很糟，那里有很多失业者极其骚动不安；最后，在意大利获得自由之后，也不可能把选举的作用限定在有着 2800 万人口的 50 万公民的身上，而忘记了选举的职能非常明确地写在了他们读过的书中，忘记了直到那时还没有找到一种方法来培育人民的自由，即教育人民，忘记了给他们自由是要让其通过经验，甚至是通过绞尽脑汁来研究自由。在他们的可能是高尚的希冀的意图中，有一种无意的可笑的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西，马尔蒂尼①对此有一比，说这就像阿尔雷凯诺②一样单纯，他给他的孩子们小号和小鼓让他们玩，但又不让他们发出声音来。

在完成统一的 10 年期间，右翼的理想不是没有受到一些干扰的，但仍具有现实的面貌，那时一种本能的明智使他们集中愿望于获得威尼斯和罗马这两个目的上；在 1870 年以后的最初几年，当失败的幽灵临近时，对手也同样是明智的，他们尽管反对右翼，仍把大大地强化税收以实现平衡的任务交给了它。但罗马问题和平衡问题解决之后，在 1865 年的选举和 1874 年的选举——议会中出现了所谓“新人”的事件，排斥了很多老的爱国者——中发生的那些冲突所采取的形式可能是激烈的和决定性的：利益被侵犯的集团（特别是南方诸省）的抵抗再也不能被压制下去了；“国王的国家”酝酿反对“法律的国家”；在第一次的议会辩论中，右翼倒台。这种倒台，并不是简单地像一个离开政府的政党，在通过反对和强化自己的力量之后又重新执掌政府的那种中间的倒台，而是倒台于自己观念中的那种倒台，如那种坚持抽象的完善的意图。当时，甚至在较长时间之后，右翼的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左翼的人也是如此，因为无论是这方还是那方，都有着纯粹的自由主义的气质，尽管当时由普遍性的可靠的感觉塑造出的“议会革命”的定义应引导他们去思考和探寻。

可是，那种倒台也并不意味着意大利政治生活的没落，而是意味着从非常时期转向正常时期。自由主义的观念并没有因此而丧失，它不只存留在于右翼的那些人中——他们仍然参与政治生

① 马尔蒂尼（F Martini，1841—1928 年），意大利作家、政治家，曾任意大利王国公共教育部部长、殖民地部部长、参议员。——译注

② 阿尔雷凯诺（Arlecchino），意大利 16—18 世纪的艺术喜剧中的丑角。——译注

活，有时还作为制约者在行动，有时还帮助良好法律的通过；而他们的已负责任的老的反对者，却被迫地要盯紧他们那一极；这样，右翼渐渐地在政治斗争的冲突和震荡中，在永远是不平衡和又重新平衡中，起到了保持平衡的作用。针对“瘟疫”，即当时人们所说的腐败——这可能归于民主方法的滥用，德·桑克蒂斯①（还有其他人）在1877－1878年写给《权力》的一系列激烈文章中进行了抨击。这些文章似乎是指责他所加入的那个党派的，但可以肯定地是指向这个党派的代表人物和行为方式的，这些方式扩大了腐败，并且正在形成一种风气。在大量走进左翼的年轻人中，形成了“中左”的一些人，后来又形成了表明右翼一些需要的“中右”的一些人；德普雷蒂斯常常和他内心敬重的对手一致。我记得有一次，那是1885年，斯帕文塔在给一份报纸的一封信中把意大利的政治说成是抗议者的喊叫和部长支持者的谩骂的“泥潭”，一天晚上，我听他讲过，可怜的德普雷蒂斯针对他的同党的不得体的提问和压力，曾高喊：“斯帕文塔说得有道理，我们陷入了泥潭，泥都到了眼睛！”当然，右翼的并非少数的人和那些有着相同气质和品格的人，并不想以某种方式屈从于启动意大利政治生活的这种必然的东西；像曾忍受他所评论的加富尔政治中的“双重性”，后来又为右翼在1874年的选举战中所做的承诺而痛苦的兰扎；像不动摇地坚持其信念，毫不留情地进行道德和严厉的不顾面子的评判的斯帕文塔，怎么会屈从呢？他们两人都是这样的人，由于谨慎和害怕感情用事，接受朋友的请求时总是犹豫，准备说不，对于对手和敌人的那些请求却并非如此。但要知道，政治就是政治，对一些妥协，一些手法，一些人的品质

① 德·桑克蒂斯（De Sanctis，1817—1883年），意大利文学评论家、自由主义爱国者；主张建立一个主张立宪、主张改革的“年轻的右翼”。——译注

感到厌恶的人，就要远离它们，或只能做他不感到厌烦之事，这既是尊重自己，也是尊重别人，他不能做所有其他之事，如果不违背意愿或笨拙地去做的话。另一方面，那种狭义上所称的政治只是政治活动的一部分，尽管是最明显的一部分。在政治活动中，还包括获得同胞的道德权威，给他们提供教诲和别处找不到的劝诫，提供建立在榜样之上的生动的良好教育。如果一种坏名声要给予右翼的那些人的话，那就是在 1876 年以后，一开始还无效地把他们的党当成是政府的执政党，但在政府中，这种努力并未成功，尽管他们选出了非常能干的塞拉为他们的领袖；由于事物的逻辑性已宣告了它的判决，他们遭到了轻视，陷入了悲观，灰心丧气（尽管他们不想这样），而不是理解和执行他们的纯粹的调解的功能，盐的功能，如果盐都变得没味了，那还有办法再加盐吗？

如果说右翼的倒台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痛苦，产生了多数人（对政治）的不信任感，提出了对意大利政治进行谴责的判断——这些判断混淆和掩盖住了那个时代的真正面貌，那么与此类似并更为严重的结果是产生出了，当时政治过程的另一种走向：大的党派的解体，它们代表人物的政治色彩或多种政治色彩的变换，和没有被更准确的其他名称替代老名称的特殊意义的渐渐消失。这里所说的悲观，不单是右翼人士及其支持者的，而是所有人的，这种判断并不涉及意大利人的道德和知识水准的高低，但涉及到根据自由的、议会的生活之规则，他们自我管理的能力。1876 年至 1886 年之间，所有的文章都主要是围绕着这一点的；报纸上的选举演说和辩论不断出现； 1878 年，这方面的一位学者德·拉韦勒耶①来到意大利，他发现他拜访过的所有沙

① 拉韦勒耶（Laveleye de E，1822—1892年），法国政治学教授、社会主义者。——译注

龙，他与之交谈的所有政治人物和所有的有理解力的人都在讨论这一点。左翼掌权——由此，人们赞扬国王，因为他把多年的反对者（其大部分是共和主义者）招到多年的纯粹的保皇党的位置上，表明了他对自由主义的立宪和议会变化的信任——并没有使得左翼的党的整体，也没有使它的反对党的整体团结起来，离心倾向反而更加明显，使得那两个整体分解，去掉了一开始有或似乎有的各自的明显的路线。当时面临的压倒一切的问题是完成统一的问题，在统一的问题上，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要快速和冒险地实现统一，另一派则要缓慢但稳健地实现统一；一派要意大利自己完成统一或者说让它的人民，即加里波第义勇军完成统一，另一派则认为意大利要依靠欧洲列强，通过外交手段，采取结盟，只有在有利的时机才诉诸武力。在注意经济、强化税收的人和主张减少税收和扩大消费的人之间，这种分别一直持续到1870年以后：这种冲突在想象上有些类似于保守派和进步派两个古典党派的那种冲突。但当要给予保守和进步以真正的、而非比喻的、虚构的意义时，这种表面的东西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很清楚，当时的这个党派或那个党派，右翼和左翼，在他们的总体方向上，既是保守者又是进步者，分歧只产生在具体的、个别的问题上。在这些问题上，这两个假定的党派的每个成员都同意或不同意他们自己的党派，或同意或不同意其对立的党派；所以在个别问题的每个问题上都结成或分成政治人物的群组。和选举上议院，下议院议员的津贴，过去遗留的问题和立宪的疑点一起，卡伊罗利①和克里斯皮②要求把选举扩大到普选；但在他们的党

① 卡伊罗利（B. Cairoli，1825—1889 年），意大利政治家、左翼领袖。 ——译注

② 克里斯皮（F. Crispi，1819—1901年），意大利政治家，主张共和制，统一后，曾掌握意大利王国的内政外交。 ——译注

派内，德普雷蒂斯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主张适当地扩大，而尼科泰拉①甚至连这点都有保留；右翼的那些人中，塞拉是支持的，但那是当最后它被实行时并没产生预料的任何灾难，选民的质量不仅没有恶化，反而在整体上有所提升之时。关于磨面税、塞拉坚定地认为必须采用，但明盖蒂倾向于取消，当要全面地迅速地取消时，有一位左翼的部长，格里马尔迪却反对并辞职，他说“算术并不是政见”。关于国家和教会的关系，兰扎和明盖蒂遵循的是加富尔的公式：在自由国家里的自由的教会；斯帕文塔赞同国家反对教会，也就是说，现代的国家反对古老的国家，或者（如果喜欢用另一种不同的说法）是现代的教会反对古老的教会；塞拉主张国家干预教会的理论，在教会中看到了现代社会的“巨大危险”，担心国家掉以轻心，抛弃当时拥有的防卫和进攻教会的武器，赞成左翼部长曼奇尼的有关禁止神职人员滥用职权的法律草案。在一直提出但从未定下的意图，行政分权的问题上，右翼的那些人和左翼的那些人一样，是有争议和疑虑的。在经济问题上，如在铁路建设上，自由贸易主义者选择把此事委托给私有工业，而垄断主义者却要把此事交由国家完成，在其他领域，情形也是一样。在内政上，尼科泰拉——他要保有软禁和训诫院，禁止大型集会和共和党、半共和党的庆祝会，解散工人社团，把罢工的煽动者押往小岛上——和克里斯皮同意右翼的更专制的部长们的一些论点，而厌烦集会自由、坚持镇压而不是预防原则的扎纳尔德利②和里卡索利及其他的右翼的纯粹的自主主义者没有分歧，在这方面，右翼的纯粹自由主义者不可能不向这位左翼人

① 尼科泰拉（G. Nicotera，1828—1894年），爱国者、政治家，曾两次出任意大利王国内政部长。——译注

② 扎纳尔德利（G. Zanardelli，1826—1903年），意大利王国首相（1901—1903年），曾任司法和内政部长（1876年以后）。——译注

士对司法独立而表示出的一丝不苟的敬意鼓掌。在行政管理上——斯帕文塔是主要的提出者和支持者——反对党派政府滥用权力之保证的提议受到了欢迎，并成立了一个机构，政务院第四部，由克里斯皮执掌，而斯帕文塔想成为它的主席和管理者。地产税摊派法是左翼执掌的一个部的工作，明盖蒂和右翼的其他人士与之进行了有效的合作。针对克里斯皮关于通过政令建立和取消一些部的非法性质，由斯帕文塔提出这有违宪法的异议得到了左翼的另一个政府的采纳，较晚的时候终于变成了国家的一项法律。对于看到事实的人来说，事情就这样前行着。

然而，人们一般相信和有着这样的概念，没有各党派的明显区别，没有它们之间相互斗争和在政府中相互轮换的保守和进步的两大政党，一个健康的议会制度是不可能的。可是阻止它们把它们的河水搅在一起，在可怕的责骂声中，规劝和呼吁它们应该流入哪个河道或给自己挖出一条河道是很难的。“左翼的纲领”，“左翼的理想”一直在被呼唤，但它们并没有力量阻挡两个队列的相互渗透。德普雷蒂斯，由于他打破了“左翼纲领”的信念，从他掌握的第一个部开始，便遭到卡伊罗利的合法的极“左”队伍和贝尔塔尼①的共和主义者队伍的攻击，在他后来掌管的各部中，则更糟，他得依靠那些部里的中间派和右派。后来，人们在日常的用法中，又给了他一个积极的称呼，“历史的左派”，这实际上标志着老的左翼已经死亡。克里斯皮在 1878 年 12 月 7 日的一次讲演中说：“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得右翼的一些人相信他们能扰乱我们的党……我呼吁所有人的爱国主义，不要发出怨恨，我们正准备在议会里组织两个政党，以使每个党都在它朋友

① 贝尔塔尼（A. Bertani，1812—1886 年），意大利议会议员、极左派领袖。——译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